

金 陵 邑 治 所 辩

李蔚然

(南京博物馆 江苏南京 210000)

[摘 要] 本文根据文献资料记载及作者长期从事南京地区文物考古工作的实践,对南京历史上楚国所建金陵邑即“今石头城”的传统说法提出置疑,并从《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山谦之《丹阳记》的记载出发,对金陵邑治的所在位置提出了个人的意见。

[关键词] 金陵邑 石头城 景定建康志 世说新语刘注 山谦之 丹阳记 位置

[中图分类号] B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5866(2000)03—0006—04

An Argument about the Location
of the City of Jinling

Li Weiran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historical records and the author’s archaeological work in Nanjing area for a long time,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his argument against the traditional statement about the city of Jinling built by Kingdom of Chu. The author also offers his own view on the location of the city of Jinling, which is based on Liu Xiaobiao’s notes to 《Shishou xinyu》, in which he quoted the historical record 《Records of Danyang》.

Key words: The City of Jinling, the Stone city, Jingding Jiankang Records, Liu’s notes to 《Shishou xinyu》, Shan Qianzhi, 《Record of Danyan》, location

越城是越楚争霸江东、越国建立的前沿据点,金陵邑乃楚国统一江左后,设官守土的地方治所。金陵邑的存在、社会秩序的恢复、人们生活的安定、长江中下游文化的交往,使江左步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其后人口逐年增多。生产力不断发展,金陵遂成为上控荆楚、下驭吴越的江东重镇。

地方建制称邑,并非始于荆楚,其历史之悠久,则远至商周之前。《吕氏春秋·贵因》:“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史记·五帝纪》

“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这就是说邑的存在与人口变迁有着密切关联。自秦统一六国普立郡县后,通称邑为县。今南京地区与金陵邑同时共存的,尚有棠邑(六合县),皆楚所立。地方文献中的金陵邑,既为邑名(邑治)亦为城名。《景定建康志》卷二十《城阙志》:金陵邑城“楚威王灭越,私吴越之富,擅江海之利,置金陵邑于石头。”又说“周显王三十六年,越为楚所灭(楚灭越实为周显王十年,公元前355年),乃因山立号,置金陵邑,今石头城是

也。”这就是说，石头城是在金陵邑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或者说石头城就是当年的金陵邑城，否则就不会有“今石头城是也”的记载。而石头城的城周“七里一百步”的数据，也是南京地方志共同记录。但从城的作用、周长、地理位置，以及当时斗争形势分析，金陵邑的所在位置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例如文献记载“七里一百步”的城周，是指孙权营建石头城的城周，还是金陵邑的城周？如果是指孙权时的城周，是没多大问题的，因这时的城郭较前有所增广；假若是指金陵邑的城周，那就不够确切了。二者时代不同，岂可同日而语，而金陵邑城是否置于此地，也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兹就个人所见，对金陵邑城的周长，所在地址等提出几点不成熟的见解和认识。

春秋战国之际，城国都不太大，仅起堡垒和掩护统治阶级安全作用。如常州附近的淹城（不包括汉筑外城），南京的越城，溧水的吴固城，其城周都未超过三里。越城的城周为“二里八十步”，固城更小，只有“一里九十步”。从史籍记载来说，城周超过三里的极少。《孟子·公孙丑下》“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由此可见，当时的城周不广，即便是外城（部）亦未超过七里。越城与金陵邑城是否筑有外部，未见任何史籍和文献记载，这就表明，城周七里一百步的石头城，既不是在楚金陵邑城基础上建立，更不是楚金陵邑城，当系孙权时新筑。

春秋战国时期，金陵地处“吴头楚尾”。楚灭越，统一后的江左，虽然日渐安定，但人口仍很稀少。以西汉末年人口为例，金陵地属秣陵县，隶丹阳郡，当时丹阳郡共十七县，实有“户十万七千五百四十一，口四十万五千一百七十一”。每县约二万四千人左右。即使楚越之争对金陵影响不大，当时金陵人口绝不会超过此数。从地理形势分析，地方百里、聚居人口不多的金陵，统治者绝不会选择地势低洼，常年遭受江水之害的石头、马鞍二山之间水网地带作为金陵邑的邑治所在。由六百年后的永和七年（公元351年）七月、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十二月、太元十七年（公元392年）六月、元兴三年（公元404年）和祯明元年（公元587年）的水情来看，石头城时常受淹的事实是存在的。特别是永和七年七月的那次大水，“死者数百人”。经孙吴与东晋长期经营治理的石头，尚不时受到江水的侵袭，那么远在公元前333年楚国占有金陵时期，此处水患就可想而知了。据此推断，金陵邑

是不会设于此处的。但必须说明，孙权之所以选择这里作为营建石头的所在地，主要是因为此处是建业通往江北的重要咽喉之地，筑城于石头马鞍二山之间，势若猛虎雄踞于出入石头津的要道。而先秦时的津渡并不在此，而是位于它的下游江乘（今栖霞山一带），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东巡会稽回归时，就是从那里渡江北上的。可以说楚建金陵邑于此是没有必要的。

为弄清金陵邑的真正所在，不妨以越城所处地段作为参考，因越城与金陵邑城属于同一时代的建筑。越城的存在和所在地的选择，可能对其有一定影响。越城建于公元前472年，即周元王四年。城“周迴二里八十步”，建于何地，历来说法不一。《景定建康志》古城郭引《嘉靖实录》注：“越王筑城江上镇，今淮水南一里半，废越城是也。”又说“城东南角近故城望国门，桥北即吴牙门将军陆机宅。……此城在三井岗东南一里，今瓦棺阁在岗东偏也。”《金陵故事》：“临淮有二陆读书堂，其迹犹存。”《景定建康志》卷四十二《第宅》陆机宅“在秦淮侧。”综上所述，越城距淮水不远，仅一里左右，瓦棺阁在它的东面，其位置约今中华门内西侧的花岗一带。古时这里地势高敞，北临淮水，南靠落马涧，水上运输方便，符合古人傍水而居的生活习惯。由此可以看出，楚灭越之后，建金陵邑于常年遭受水患的石头马鞍二山之间，是毫无道理的。

金陵邑究竟置于何地，值得重视的则是《丹阳记》中的一段记载。《世说新语·轻诋》注引“丹阳治城，去宫三里，吴时鼓铸之所，吴平犹不废。”又云“孙权筑冶城，为鼓铸之所，既立石头大坞，不容近立此小城，当是徙县治，空城而置冶尔，冶城疑是金陵本治。汉高六年（公元前201年）令天下县邑，秣陵不应独无。”这段论述不但否定了已往“吴王夫差冶城铸剑”的错误传说，并且指出孙权于此设治“当是徙县治空城而置冶。”此处所说的县治，应是指汉高祖六年秣陵县的县治所在地，秣陵县治的前身“疑是金陵本治”。古代邑县的治所乃至州郡之治所的因袭本是常事，有的延至数代或数百年之久，秣陵县治因袭金陵邑治不是不可能的。《世说新语》乃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丹阳记》则为山谦之撰，是记录金陵事迹较早著作。谦之生于晋末而歿于刘宋，距金陵邑的设立仅七百年左右。古时金陵人口稀少，地貌变化不大，邑县治所设于何处，这对时间相隔不太长久的山谦之来说，

还是比较清楚的,也是有迹可寻的。《丹阳记》称石头为“大坞”而不称城,反映城坞之间是有区别的,石头坞仍属汉末三国割据时期坞堡性的建筑,周长是否“七里一百步”也是值得怀疑的。最主要的一点则是,如果石头坞真的建立金陵邑的基础上,山谦之在他《丹阳记》中,何以只字不提,反而疑冶城系“金陵本治”?所谓本治,就是邑治的所在地,表明刘宋之前未有任何论述涉及石头与金陵邑之间的关系,亦未见任何典籍提及金陵邑址究竟位于何处,更不见“乃因山立号,置金陵邑,今石头城是也”的论断。所以山谦之在不见前人评说金陵邑治所在的地情况下,疑冶城为“金陵本治”不是没有道理的。因这一论断在当时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所以刘孝标能够大胆注释冶城的起始。其实金陵是泛指地区而言,或指钟山的前身(金陵山)。“乃因山立号”的说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石头就是石头,金陵即是金陵,二山名称不同,岂容相互混淆?因山立号自然不能成立。从地理形势观察,冶山西临大江、岗峦起伏、丘岭连绵,与今日之五台、清凉诸山形断脉连,同淮水之南的越城遥遥相望,作为邑治,远比石头为宜。

那么何以后人会把金陵与石头连系在一起呢?其主要原因应是孙吴时期同时有二个石头城存在,一座位于石头马鞍二山之间,即公元212年(汉建安十七年)所筑。另一座位于今水西门附近原淮水西通大江的出口处,系公元229年(吴黄龙元年)孙权徙都建业之后所立。这就是《吴书·嗣主传·孙休传》中所说火烧西南一百八十丈的“石头小城”。《景定建康志》引《六朝记》“孙权沿淮立栅,又于江岸之地筑城,名曰石头,常以心腹大臣镇守之。”引文中的所谓“又于”,系指在原有石头之后而另立新城而言,并非因山立号的石头。这座石城距冶城仅有里许,虽然在石头之后加一“小”字,因城名相同,后人往往将二城混为一城,故地方文献中只有因山立号“城周七里一百步”的石头,却无“火烧西南一百八十丈”石头小城的城址。因城名相同,将二城混而为一的现象也是不可避免的。如以冶城来说,本系吴王孙权修筑,结果却成了吴王夫差所筑冶铸兵器的作坊,同是吴王,如果不是“孙权筑冶城为鼓铸之所”出现于《丹阳记》中,后人真的以为冶城系吴王夫差所筑。建在冶山的“金陵本治”既然靠近沿淮立栅的石头小城,如果后人不加分析,很可能将其转嫁至

另外的石头,即因山立号的石头。

地方文献中虽然没两个石头山之说,但距冶城不远尚有另一个石头也是可以肯定的。《世说新语·轻诋》:“庾公(亮)权重,足倾王公(导),庾在石头,王在冶城坐,大风扬尘,王以扇拂面曰,元规(庾亮字)尘污人。”这段记载说明石头与冶城相距不远,庾亮所在的石头是山名还是作坊之名,则是值得注意的。如果是山名,指的当是马鞍附近的石头山,不说是古代,而从现在的地理形势来看,冶山与石头不仅相距数里之遥,且其中有峨嵋、五台、清凉诸山相隔,即使十级大风,也不可能将石头山的烟尘吹至冶城,更何况史籍中很难见到石头马鞍二山附近没有冶铸作坊的记载。由此可知,庾亮所在的石头,绝非指的公元212年孙权营建石头坞的石头,可能属于冶铸作坊的名称,征西大将军庾亮之所以出现于石头,应同检查军器生产有关。因此时的冶城已是王导的西园,故王导以丹阳太守(尹)的身份,命令冶令奕邈将作坊迁往他处,这就是当时生产军器的重要作坊“东冶”。从此冶城附近的石头消失,正因为冶城附近石头的消失,原设于冶山的楚“金陵本治”,随着此石头的名亡而转移至彼石头也是大有可能的。这是事出有因,而不是巧合。

另外一点则是《世说新语·轻诋》注引《丹阳记》中的“石头大坞”问题,坞是可战可守的土堡,主要为适应战争和防守需要而设立,并非一般城郭。《后汉书》马援传“缮城郭,起坞侯”。同书董卓传“又筑坞于郿,高厚七丈,号曰万岁坞。”可以看出,马援传中的“城郭”与“坞侯”作用虽然相近,实属两种不同形制的建筑。在梁萧统编、唐李善注左思《吴都赋》118注释中,仍称石城为“石头坞”,既未提及石头坞的周长,亦未涉及它与金陵邑的历史关系。李善在唐高宗时官宗贤馆直学士,虽不是地理学家,却是桃李满天下的一代名儒,对文选的注释是比较慎重的,如果石头坞确系建于金陵邑旧址之上,不会一字不提,表明石头城与金陵邑毫无关系,因此“置金陵邑于石头,今石头城是也”的说法,它同吴王夫差冶城铸剑一样,属于错误传说。这一传说,可能起于唐代初期。

总的来说,从历史发展、城的作用、文献记载和现存遗迹剖析,春秋战国时期城的周长超过三里而长达七里的实很少见,楚灭越后,江东已无他国与其争雄,金陵并非统治中心,亦非战争

要地，其城周是不会超越历史发展进程的。

就金陵人口、地理位置、争霸中原的形势而论，楚威王熊商是没有必要筑金陵邑于石头马鞍二山之间水网地带的，更没有必要将邑治置于那里。因此“置金陵邑石头”的说法，是不能使人信服的。

笔者认为，《世说新语》引《丹阳记》“冶城疑是金陵本治”的记述应当是值得参考的。在该书问世之前，史籍和地方文献很少涉及金陵邑的所在，亦无石头坞即金陵邑的论断。然而自《六

朝记》与《金陵故事》成书之后，已为地方志撰写时的主要参考书籍，以上所述的越城、冶城、金陵邑城等在二书中均有记载。对金陵邑所涉及的除上述二书外，尚有《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诸书，均为后世考证古城郭的重要依据，至于这些书的记述是否确切，出处何在，则另当别论。然笔者自愧知识浅陋，见闻有限，论点是否有当，尚待专家与读者点拨评说。

（责任编辑：邱 敏）

作者须知

本刊为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2000 年被评为全国教院系统优秀学报。主要刊载语言、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改革、管理、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的学术论文。从2000年开始按《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的要求，标准化、规范化出刊，现将有关事宜敬告作者。

来稿必须包含如下事项：中英文题名、作者（姓名和拼音姓名）、单位、地址、邮编、中英文摘要、关键词、作者简介、注释及参考文献，并注意以下几点：

- ①摘要应直叙要义，切忌“本文论述”类评价性语言。篇幅为100字左右；关键词3—5个。中英文摘要、关键词置于正文之前。
 - ②单位、地址、邮编置于作者姓名正下方，格式为：单位名称 具体部门名称 省名市名 邮编
 - ③作者简介置于首页地脚（左下方），格式为：作者简介：姓名、性别、出生年月、籍贯、职称职务（须标出具体部门），学位。
 - ④参考文献的排列依次为：著者、题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月。
- 欢迎赐稿，谢谢合作！

编辑部

2000.9